

#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独裁思想

左玉河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复宣传所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的专制统治。它不仅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企图将全国民众思想集中于所谓“三民主义”,给自己的独裁统治披上“三民主义”的合法外衣,而且压制战时民主运动;不仅通过建立战时集权体制,确立了蒋介石的独裁地位,把个人独裁合法化,而且鼓吹“一个领袖”,力图把个人独裁合理化。国民党强化个人独裁与一党专制统治,受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民主进步力量的严厉批判和坚决抵制。

**关键词:**国民党;一党专政;三民主义;独裁思想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5.05.016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与各中间党派的强烈呼吁下,国民党政府被迫有限度地开放部分政权,并成立了国民参政会,作为各党派推动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平台,但并没有放弃一党专制的独裁体制及独裁思想。国民党反复宣传所谓“一个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体现了其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的核心政治理念。国民党不仅顽固反对共产主义,而且坚决反对自由主义;不仅回避民权主义问题,而且压制战时民主运动。国民党不仅通过建立战时集权体制,确立了蒋介石的独裁地位,把蒋介石个人独裁合法化,而且鼓吹“一个领袖”,力图把蒋介石个人独裁合理化。国民党强化个人独裁与一党专制,与战时民主自由的时代潮流相违背,与社会各界保障民权自由的政治诉求相违背,故受到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民主进步力量的严厉批判和坚决抵制。

## 一、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理念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正面战场的失利和日寇的扶植,沦陷区出现了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相对峙的汪记国民政府。这个国民政府尽管是日寇的傀儡,但仍然以国民党“正统”自居,以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为旗号。面对这种新情况,蒋介石及迁都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必须加以正面回应,证明蒋记重庆国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说明蒋介石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才是中华民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对外代表中华民国行使主权,对内代表各民族各阶级民众行使统治权。在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看来,中华民国统一合法的中央政府是蒋记国民政府,而不是汪记国民政府,更不是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及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中华民国的政令、军令应该统一于蒋记国民政府。

为什么抗战时期蒋记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合法的统一的中央政府?这是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释的。因为蒋记国民政府统掌中华民国的全国政权,同样面临着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其一贯标榜的所谓革命性与人民性。但所谓“革命性”,是蒋记国民政府与汪记国民政府共同拥有的政治资源,并非为蒋记国民政府所独有。从某种意义上,汪精卫作为辛亥革命元老和国民党资深领袖,更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色彩,并不逊于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此外,中共领导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及抗战后改组之陕甘宁边区政府,同样是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政府,其革命性远比蒋记国民政府和汪记国民政府更突出更鲜明。因此,革命性并非蒋记国民政府之特色,不足以支撑其政权之合法性。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DF2023YS21)。

**作者简介:**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01; zuoyh@cass.org.cn)。

既然革命性不足以支撑蒋记国民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统一的中央政令之合法性,那么,支撑民国中央政府合法性的关键,就只能是“人民性”,看谁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民意——对内代表广大民众意志与要求,对外代表国家主权与意志。代表民意,对内就要实行民主,给予民众以自由平等的基本权利;对外就需要抗拒暴日侵略,保持国家独立与自由,使民众免受外族奴役。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才算真正代表了所谓民意。只有代表民意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是真正合法的国民政府。在国民党看来,蒋记国民政府比汪记国民政府具有合法性,需要政令的统一,其理论依据就是能够反映民意——内而实行民主以保障民众权利,外而实行抗战以实现国家独立。汪记国民政府之所以不具有合法性,就是因为它是中华民国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政权,难以代表中国民众争取国家独立自由之公意。

因此,抗日以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自由,是抗战时期蒋记国民政府合法性的最有力保障。据蒋介石日记披露:1937年12月28日,面临南京沦陷后军事溃败及日本诱降,蒋介石在国防会议后对汪精卫、孔祥熙说: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认〔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与民族永远之束缚,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无〕所凭藉,我国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也”<sup>①</sup>。如果求和降日,不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将失去执政的合法性,而且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因此,坚持抗战到底,是蒋记国民政府合法性的最大依据,当然也是抗战时期获得各党派及广大民众支持的最大理由。

尽管抗战时期蒋记国民政府在实行民主给予民众民主权利方面做得并不到位,但它坚持抗战到底,始终没有放弃抗日的旗帜,符合中国民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取得了执政的最大合法性。同时,尽管它坚持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实行独裁统治,但它始终不敢正面否定民主,并极力标榜自己要实行民主,要还政于民,以取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证明自己是愿意代表民意的。因此,蒋记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保障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自由,是其政权合法性的根本保障。但拖延实行民主,不能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与个人自由,则说明它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因此必然受到中共和进步力量的猛烈抨击。

蒋记国民政府是抗战时期代表中华民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标榜着代表民意执掌国家统治权。但蒋介石和国民党执掌政权的方式,是通过“党国体制”实现的,即通过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方式实现的。在国民党看来,国民党执掌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孙中山“以党建国”的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在国民党看来,国民党及其领袖是中国的先知先觉者,是广大人民的诸葛亮,人民则是不知不觉者,是需要扶助的刘阿斗。国民党以先知先觉者和民意代表者来为民众构建国家的蓝图,代表民众负有建国执政之大任。因此,国民党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军政时期)后,要实行政政;国民党独揽中华民国政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掌中华民国军政大权,以党建政,以党治国,以党统军,实行党国体制。

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初,依据孙中山的训政理论实行以党治国及一党专政,自认为有其合法性与充足的理由。但原定六年的训政时期一再延长,召开还政于民的国民大会一次次推延,并将中共及其他党派排斥于中央政权之外,国民党一党专政及党国体制就不能不受到各党派的猛烈抨击。为什么中共及其他党派不能参与中央政府及国家管理?为什么国民党要坚持一党专政而不能开放政权?为什么国民政府只能为国民党一党独揽而不容其他党派参与?这样,国民党同样必须从理论上解决其一党专政的合法性问题。

抗战时期,国民党以抗战需要统一党政军权力、统一军令政令为名,标榜“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鼓吹“一个政党”,坚持一党专政,强化党国体制,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战时

<sup>①</sup>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台北:“国史馆”,2014年,第454页。

体制。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明确指出：“抗战以来，国民革命即已转入第二时期。前一期革命在消灭军阀之势力而奠定国家之统一，第二期革命则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争取国家民族之自由平等。”<sup>①</sup>国民党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争取国家民族之自由平等”作为抗战时期的主要任务，而对还政于民的国民大会则极力推延与敷衍，旨在维护其一党专政的局面。

尽管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但国民党并未在理论上对其一党专政的合法性给予有力的阐释，因而在政治上不能不处于被动地位。在中共及各党派推动下，尤其是抗战时期的两次民主运动，迫使国民党承诺尽快结束训政，召开国民大会。然而，国民党虽然一再宣布要召开还政于民的国民大会，但却寻找借口一再延期召开，继续坚持一党专制。整个抗战时期也未将早已承诺的召开国民大会的许诺予以兑现。

1935年，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确定193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但因故延期举行；1937年初，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确定1937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但因抗战爆发而再次延期；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以期早日制定宪法，完成建国任务；1940年9月18日国民党中央会以“各地交通因受战事影响颇多不便”为由第三次延期。1943年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务于抗战结束之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实行总理所主张之民权政治。”<sup>②</sup>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宣布将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六中全会再次通过决议，决定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但这次会议仍然没有如期召开，而是第四次延期。直到1946年11月，国民党才在没有中共与民盟参加的情况下，非法召开了所谓国民大会。

从国民大会一再延期的情况看，国民党对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并不热心，也缺乏诚意，其维护一党专政的意图甚为明显。实施一党专政而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这样的专政是难以为人接受和持久下去的，故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合法性始终受到人们的怀疑。既然一党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不足，国民党就只能靠不断的宣传欺骗和武力高压手段来维持其统治，由此采取建立特务组织、强化保甲制度、实施特种教育等统治手段，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 二、国民党“一个主义”的理论误区

抗战时期，国民党标榜“抗战建国”，将抗战与建国并重，其所要建设的国家目标是什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宣言曰：“抗战建国同时并进，此为我抗战以来决定之国策。吾人今日所欲努力建成之国家，乃为三民主义之共和国。”<sup>③</sup>在国民党看来，三民主义不仅是国民党人必须遵循的核心理论，而且作为抗战建国之最高原则与指导思想，也是“端正全国思想之趋向”“纠正纷歧错杂之思想”的最高思想原则，全国民众必须信奉三民主义。1939年3月通过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的目标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sup>④</sup>；不准违背三民主义最高信仰及原则；不准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

国民党试图论证为什么三民主义能够成为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和指导思想，为什么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等其他理论就不适合中国国情。国民党一方面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进行批评、批判和责难，另一方面则论证三民主义的正当性、合理性和正确性。但从总体上看，国民党对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正面回应较少，更多的是污蔑和谩骂；其对民主党派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理论同样回应乏力，难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551页。

②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834页。

③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673—674页。

④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胜利》1939年第19期。



以为人所认同;其对国家社会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国青年党的国家社会主义及中华民族社会党标榜的新民族主义,则基本不予回应。国民党对三民主义之外的各种思想难以从理论上驳倒,其三民主义理论则空洞教条,不能从理论上阐释三民主义的科学与正确性,更难以说明为什么抗战建国只需要信仰“一个主义”——三民主义。因此,尽管国民党宣传“一个主义”,并高唱“意志集中”,要将全国人民的思想集中于蒋记三民主义,但其理论的贫乏决定了其实践的无效。

蒋介石及国民党在对待民族利益与政党利益关系问题上,往往重视国民党的党派利益,忽略或回避了对民族和国家的主体——中国广大民众的关注。蒋介石片面强调国家和民族的神圣性,高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口号,要求民众无条件听从国家指挥,放弃个人所享有的自由权利,把一切交给国家。在民族危机的非常时期,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对这种带有极权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尚能暂时性地有限度地忍耐,但这种剥夺民众自由权利的极权主义,毕竟与民族独立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潮流相背离,故当民族危机减轻后必然受到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及广大民众的抵制。

国民党构建的战时体制,既是其强化独裁统治的措施,也是其独裁统治的体现。国民党通过不断向民众灌输“一个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理念,来维护其独裁统治。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强调“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勉迈进”<sup>①</sup>。国民党强调,“积极加强并统一本党之民众运动,使各阶层民众,皆在本党领导之下,努力实行三民主义”<sup>②</sup>。国民党还要求:“而当兹强邻压境,国家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秋,各界人士,不问其派别如何,尤应捐除成见,在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之下。”<sup>③</sup>国民党规定民众必须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sup>④</sup>进行活动。这显然是利用人们对三民主义的尊崇实行思想文化控制。

国民党鼓吹“一个主义”,就是要将全国民众的思想集中于“三民主义”。但国民党所强调的“三民主义”,并非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原意,而是蒋介石重新阐释的带有明显蒋记特征的三民主义。就国民党内部对三民主义的解释而论,既有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解释,还有胡汉民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更有汪精卫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在国民党之外,既有邓演达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也有宋庆龄对三民主义的解释,还有李济深等人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当然,更有中共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因此,人们在认识和研究三民主义时,必然加上他自己的理解,其内容及重点自然要有所改变。蒋介石对三民主义解释说:“民族主义本乎情,民权主义本乎法,民生主义本乎理。我们以提高民族感情,求得民族的独立,以确立法治为实行民权的基础,再以公平划一的条理调剂公私经济的盈虚,以解决民生问题,如此情、理、法三者皆能厘然得当,所以三民主义比其他主义完备,而且比其他主义伟大悠久,亦比其他任何主义容易实行,亦就在这里。”<sup>⑤</sup>这种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带有明显的蒋氏特色。

抗战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之所以抓住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不放,鼓吹“一个主义”,主要是要利用这面旗帜统一人们思想,用三民主义对抗中共的共产主义和中间政派的自由主义思想。蒋介石出于维护一党专制及强化专制统治的现实需要,用了很大精力阐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将三民主义体系化,形成了蒋介石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对此,周恩来严厉批评说:“从蒋介石这一切思想体系中,我们只能看出中国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观点、消极因素,被蒋介石拿来发展成为他今天的思想体系;但孙中山的思想中还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更多的革命观点,尤其是在他晚年接近了共产党,采取了俄国革命的某些办法后,他的三民主义便成为革命

① 《抗战建国纲领》,《抗战建国旬刊》1938年第2期。

② 安徽省文物局新四军文史征集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7页。

③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88页。

④ 《抗战建国纲领》,《抗战建国旬刊》1938年第2期。

⑤ 蒋中正:《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创刊号。

的三民主义了。而蒋介石主义,却是另一套东西,只能成其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sup>①</sup>蒋记三民主义,显然带有法西斯主义毒素,不仅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而且同样不为各中间党派所接受,因而也难以达到其“一个主义”的目的。

抗战时期国共之间的冲突,从表面上看是现实的各种利害冲突,但其深层原因则是“主义”之争。蒋介石之所以抓住孙中山“三民主义”旗帜不放,之所以贬低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所有其他主义,共产党之所以对三民主义进行革命性的解释,说到底都是为了在道义上赢得国人的同情和支持,并为抗战之后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提供理论支持。因此,国共两党必然围绕着三民主义政治遗产进行激烈斗争。毛泽东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蒋介石于1943年出版《中国之命运》,两者之间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如何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典型地体现了国共之间的“主义之争”。

为了用所谓“一个主义”控制民众思想,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方面宣传三民主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攻击三民主义之外的各种思想,尤其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猛烈攻击,认为它们均不适合中国国情。1939年5月7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比较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认为这三种主义皆有缺点,而且内容很不完备,唯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以“公”字为出发点,能涵盖一切,“把各方面皆行均衡顾到,无丝毫偏颇之弊”,是“完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三民主义比其他主义完备,而且比其他主义伟大悠久,亦比其他任何主义容易实行”<sup>②</sup>。他把孙中山的“遗教”“贯串起来”,制作了一张“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声称只要按照他所制作的体系及程序表去努力,就可以立即建设一个“新中国”。显然,蒋介石的根本目的是要消除共产主义、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给自己的独裁统治披上“三民主义”的合法外衣。

1940年7月8日,蒋介石在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二周年纪念发表的《告全国青年书》中,对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作了分析,认为两者均不符合中国国情,“惟我总理所手创之三民主义则不然,发之于至诚,行之于至公,以民生哲学博爱济众为原理,以世界大同互助共享为目的,内容完备,具体可行,足以解决今日世界所有之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而毫无偏颇不全本末颠倒之弊”<sup>③</sup>。他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中,继续抨击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惟有三民主义为汇萃我整个民族意识的思想,更可以证明中国国民党为代表我全体国民的要求,和各阶级国民的利益而组织,为革命的惟一政党。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所以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我们可以说,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sup>④</sup>由此可见,蒋介石完全不顾抗战期间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的变化,完全无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巨大力量,依然念念不忘坚持一党专制,依然期待着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蒋介石和国民党因其阶级本性和政党立场,对中共信仰的共产主义进行猛烈抨击还比较容易理解,但为什么他们对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也进行猛烈攻击并反复强调其不合乎中国国情呢?除了其阶级本性和党派利益外,这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民主自由问题上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密切相关。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认识上的最大误区,是坚持强调国家自由而抹杀个人自由。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认为,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强调有根本区别。这个根本区别在于:民权主义重视国家自由而反对个人自由。正因国家民族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故应强调国家民族之自由而取消乃至牺牲个人之自由:“抗战期间政府对于人民之自由,必加

① 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0页。

② 蒋中正:《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创刊号。

③ 蒋中正:《告全国青年书》,《闽政月刊》1940年第6卷第5期。

④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第106页。

以尊重。同时亦必加以约束,使得自由于一定限度之中。约束既定,政府人民共同努力,见之实行,庶几自由与统一,乃能兼顾。”<sup>①</sup>此处所谓“统一人民之言论与行动”、“约束”人民之自由,实际上就是变相取消个人所拥有之自由权利。

国民党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进而将两者对立起来,以强调民族国家利益来取消民众个人自由权利。约束民众的个人自由,甚至牺牲个人自由以保障民族国家自由,是国民党战时民权主义的核心理念。国民党在随后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作为战时国民精神动员之最高原则加以推崇。在国民党看来,在民族生存受威胁情形下,任何个人及其事业都将失去保障,故巩固民族生存应先于一切;又因民族生存之最高政治形式为国家,故巩固国家尤应先于一切。这样,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民众在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个人自由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国民党之经典阐述为:“巩固国家尤应先于一切,是以吾人今日必须认定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国家民族之利益应高于一切,在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乃至牺牲个人之自由与生命亦非所恤。”<sup>②</sup>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罗刚不仅吹捧《中国之命运》是“我民族领袖蒋委员长的告国民书”,而且进一步发挥了蒋氏在书中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他说:“自由主义在一个混乱时期的发展,只有造成分崩离析的局面,对于国家前途,弊多利少,‘五四运动’后自由主义对国家的影响如何,在书中已经分析得很详细,我们何能自蹈覆辙。英美各国社会政治一切已经有秩序有组织,原可让自由主义自由发展,他们的国情与中国不同,何能以彼例此。而且我们反对自由主义,并不是盲目的〔地〕极端的〔地〕排斥自由主义或个人自由。”他强调:“我们要求是有限度的自由,所反对的是无限度的自由,在我们的建国的途程中,需要统一的信仰与集中的意志,凡是不破坏这两个条件的思想自由,中国国民党是从来主张不干涉的。西洋的革命,因为没有自由而争自由,争得自由以后就觉得宝贵,所以崇尚自由主义,我们历来太自由了,国民如一片散沙,将国家民族的自由亦断送了。所以我们不能再崇尚自由主义。”<sup>③</sup>

在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下,适当强调国家自由及民族生存之优先是必要的。但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口号下,完全取消个人之民主自由权利,将个人正当权利一概斥为“自私自利”“个人主义”而予以革除,显然不利于民众抗战自主性之发挥,是有很偏颇的。它过分强调国家自由而忽视个人自由,过分强调民族主义而忽视民权主义及民生主义,甚至以民族主义压制民权主义及民生主义,更是有很大问题的。国民党将国家民族独立与个人自由权利对立起来,抬高前者而贬低后者,包含着以民族主义压制民主主义、以民族救亡压制个人自由之政治企图。正因如此,国民党不仅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而且坚决反对自由主义;不仅回避民权主义问题,而且压制战时民主运动。国民党强化个人独裁与一党专制,难以满足全国社会各界之保障民主自由要求,也难以完成其所标榜的为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奠定基础之任务。

### 三、服从领袖的个人独裁理论

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宣传所谓“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同时,还鼓吹“一个领袖”。这个领袖集党政军诸种权力于一身,是真正的个人独裁者。为什么军事最高长官(军事委员会或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要兼任国民党总裁,还要兼任政府首脑(先是行政院院长,后为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的依据就是战时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只有集中军权、党权和政权,并将党政军权集中于最高领袖手中,才能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10页。

②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胜利》1939年第19期。

③ 罗刚:《读〈中国之命运〉》,《中央日报》1943年4月27日,第3版。



保证抗战力量的集中与军令政令的统一。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决议设立国防最高会议,蒋介石任主席。随后,蒋介石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39年2月改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蒋为国民党总裁。1939年后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集党政军权于一身。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后,蒋兼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及《行政院组织法》,授予国民政府主席以独裁大权: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国民政府主席任期三年,连选连任,总揽民国之治权;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五院院长及副院长候选人,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这样,抗战时期国民党建立起军事首脑兼任政党总裁及政府元首的“三位一体”独裁体制,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权力集中达到顶峰。

国民党不仅通过建立战时集中体制,确立了蒋介石的独裁地位,把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合法化,而且鼓吹“一个领袖”,力图把蒋介石个人独裁合理化。1938年7月,陈诚发表《服从领袖的真谛》一文,不仅公开倡议全国民众要服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而且系统阐述了服从领袖的意义、为什么要服从领袖、如何服从领袖。陈诚将领袖作为国家的象征、国民党的代表和三民主义的化身,从理论上说明了信仰主义就是服从领袖,服从领袖就是信仰主义。这篇文章,是为蒋介石个人独裁及国民党独裁统治进行理论化阐述的代表作。

陈诚开篇指出:“自抗战以来,全国更一致公认领袖是整个国家意志的代表,和全民族利益的拥护者,所以大家誓愿在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和一个政府领导之下,一心一德,齐步前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达成建设三民主义国家的目的。”<sup>①</sup>在他看来,很多人仅知道拥护领袖为当然,而不知服从领袖之所以然。因此,必须从理论上弄清为什么要服从领袖,弄清领袖所代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样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服从领袖。

首先,陈诚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要服从领袖。他从四个方面做了阐述。其一,蒋介石之所以被推为全国领袖,就因为他是统一的元勋、复兴民族的首领、革命集团的重心与三民主义直接继承者。其二,领袖对于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有绝对的决定意义:“只要大家能绝对服从领袖,有整齐的步伐,统一的意志,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为国效命,则强敌未有不摧,目的未有不达之理。”<sup>②</sup>其三,因为有领袖,革命才有固定的重心。其四,只要大家绝对服从领袖,绝对信仰领袖为继承总理革命事业的最高领袖,则一切关于主义之理论的解释权应完全属于领袖,根据领袖对于主义的解释,便是等于抗战建国的指导理论,也就是政治上的实践纲领。故其得出结论:“就是因为有领袖,主义才有显明的标志,任何个人或团体组织,如果反对领袖,无异反对主义,即是革命的罪人。”<sup>③</sup>

其次,陈诚从理论上阐述了领袖的意义。他指出,领袖所代表的部分:第一,领袖代表总理的精神——志事;第二,领袖代表国家的意志——独立、自由、平等;第三,领袖代表三民主义——文化、思想与信仰;第四,领袖代表全民族的利益——生活与生存(包括政治、经济、伦理)<sup>④</sup>。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总括起来说,领袖的意义,实在非常伟大,非常崇高。他代表着总理的精神志事,总理的三民主义,与夫国家的意志,和全民族的利益,故服从领袖,就等于服从总理,服从主义,服从国家,服从民族。”<sup>⑤</sup>

再次,陈诚从理论上阐述了怎样才算真诚地服从领袖。其一,要认定服从领袖为国民党党员当然之天职,不能附带任何条件或任何企图。其二,要认清服从领袖之真谛所在:“则凡国家社会一切组

① 陈诚:《服从领袖的真谛》,《领袖的认识》,国防部新中国出版社资料室,1938年,第1—2页。

② 陈诚:《服从领袖的真谛》,《领袖的认识》,第4页。

③ 陈诚:《服从领袖的真谛》,《领袖的认识》,第7页。

④ 陈诚:《服从领袖的真谛》,《领袖的认识》,第8页。

⑤ 陈诚:《服从领袖的真谛》,《领袖的认识》,第12页。

织、团体,甚至任何个人,都应该贡献一切做领袖达成其所代表的使命。”<sup>①</sup>其三,要明白尊敬与信仰领袖的道理:“一定要始终如一,矢忠矢诚,亦步亦趋地向前迈进,决不容徘徊犹豫,或自作聪明而诿诸服从领袖之名。”<sup>②</sup>其四,要牺牲个人的自由平等来服从领袖:“因为牺牲我们个人的自由,方能求国家的自由,牺牲我们个人的平等,方能求民族的平等。领袖是国家与民族的代表,我们只有将个人的一切统统贡献给领袖,才可以求得整个国家民族的自由平等。”<sup>③</sup>

最后,陈诚从理论上阐述了领袖制度就是具有中国特点的集权制度。他指出:“领袖是一种历史的新制度,在我们伟大领袖的指导之下,党政军的关系,可以大为改善,领袖集权不仅消灭了党政军的对立,而且能够逐渐的〔地〕达到精密的分工合作。同时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随着人治与法治的融和,领袖制度必能有更高度的发展,将来的文化思想,与精神信仰上,亦会创立崭新的体系。”<sup>④</sup>

作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长,陈诚在阐述三民主义青年团宗旨及团务推进方针时,仍然鼓吹“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力图将“服从领袖”思想灌输到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及其活动中。他指出,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应有的新精神是:“我们能牺牲小我以完成大我,就能使我们生命的空间扩大;我们能牺牲现在,以创造将来,就能使我们生命的时间延长,以至于‘永远不朽’。”<sup>⑤</sup>他强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团长蒋介石的命令:“故今后本团团员,要绝对服从团长的命令,执行本团的决议,推行国家的政令,负责任,守纪律,以身作则。”<sup>⑥</sup>三民主义青年团发表的《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鼓吹蒋介石为“崇高伟大彻底革命的领袖”,吹捧《中国之命运》“已为我们指示出正确明白的途径”<sup>⑦</sup>。该宣言显然继承并发挥了陈诚的服从领袖理论,借以维护蒋介石的独裁地位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国民党强化个人独裁与一党专制,与战时民主自由的时代潮流相违背,与社会各界保障民权自由的政治诉求相违背,因而受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的严厉批判和坚决抵制。中国共产党人指出,蒋介石“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之实”,“是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sup>⑧</sup>,其特点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糟粕和外国法西斯主义的混合物。中国共产党人尖锐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自己统治的区域中,“实行一党专政,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新专制主义”<sup>⑨</sup>,实行“残酷的惨无人道的压迫与剥削,比秦始皇还厉害百倍的寡头专制政治”。因此,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决不能决定中国之命运,必将走向破产和覆灭。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庄严宣告:“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sup>⑩</sup>。

总之,抗战时期的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制的集权体制及独裁思想,受到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民主进步力量的严厉批判和坚决抵制。中国共产党深刻揭露国民党的独裁思想及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对国民党的新专制主义给予彻底的清算,遏制了国民党独裁专制趋向,使全国民众受到了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信仰的共产主义才能掌握中国之命运,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① 陈诚:《服从领袖的真谛》,《领袖的认识》,第13页。

② 陈诚:《服从领袖的真谛》,《领袖的认识》,第14—15页。

③ 陈诚:《服从领袖的真谛》,《领袖的认识》,第15页。

④ 陈诚:《服从领袖的真谛》,《领袖的认识》,第17页。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35页。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三),第736页。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三),第739、738页。

⑧ 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47页。

⑨ 《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解放日报》1943年8月25日,第1版。

⑩ 《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解放日报》1943年8月25日,第1版。



## **The Kuomintang's Dictatorial Ideology During the the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uo Yu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The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P.R.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the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Kuomintang (KMT) repeatedly propagated the doctrine of “one party, one ideology, one leader,” and stubbornly upheld dictatorial rule characterized by one-party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tic leadership. The KMT opposed communism and liberalism and it attempted to unify the thoughts of the people in the name of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which it has falsely invoked to legitimize its dictatorial rule. At the same time, the KMT suppressed the wartim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and refused to terminate the tutelage period in favor of constitutional rule. By establishing a centralized wartime regime, the KMT legitimized Chiang Kai-shek's personal dictatorship, while promoting the idea of “one leader” to rationalize such rule. The KMT set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individual freedoms in opposition, elevating the former while diminishing the latter — a stance that entailed using nationalism to suppress democracy and prioritizing national salvation over personal liberty. It was precisely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 KMT not only adamantly opposed communism but also vehemently rejected liberalism. By reinforcing its dictatorial rule characterized by personal dictatorship and one-party autocracy, the KMT failed to meet the demands of all social sector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ivil rights and freedoms, nor could it fulfill its proclaimed mission of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a new China based on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The KMT's dictatorial ideology ran counter to the era's trend of wartim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As a consequence, it faced severe criticism and resolute opposition from democratic and progressive forces, represen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foundly exposed the dictatorial ideology of the KMT and its anti-communist and anti-people essence, thoroughly repudiated the KMT's new autocracy, curbed its dictatorial and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and offered the entire nation an unprecedentedly profou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people came to recognize that onl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ommunism it espoused could shape the destiny of China and build a “new China that is independent, free, democratic, unified, and prosperous”.

**Keywords:** Kuomintang; One-party dictatorship;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Dictatorial ideology

[责任编辑:王玲强]